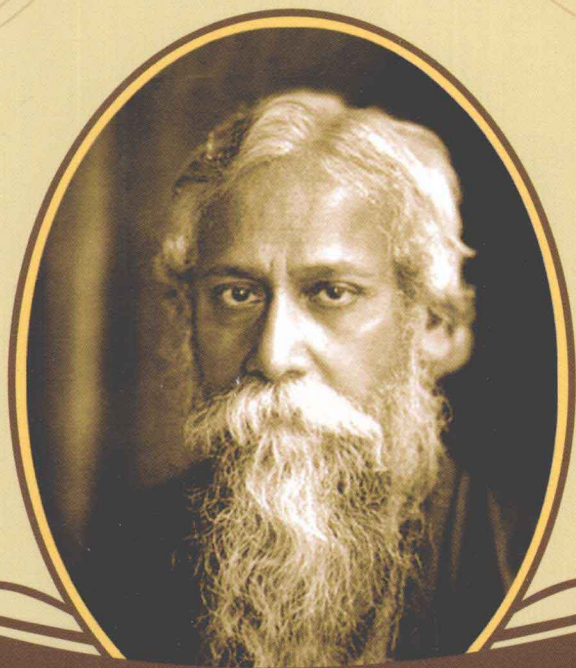


世界十大文学家

主编 曾繁亭



泰戈尔传

侯传文 著

寂园飞鸟

下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世界十大文学家
主编 曾繁亨



寂园飞鸟

泰戈尔传

侯传文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127〕 第七章 登峰造极

- 〔127〕 一 愤怒的呐喊
- 〔135〕 二 孤独的建设者
- 〔141〕 三 不懈的探索
- 〔147〕 四 神秘的体验
- 〔152〕 五 人生的象征

❧〔158〕 第八章 走向世界

- 〔158〕 一 远方的召唤
- 〔165〕 二 诺贝尔文学奖
- 〔171〕 三 葱郁的绿叶
- 〔175〕 四 纷乱的世界
- 〔179〕 五 天空飞鸟



❧〔186〕第九章 文明的汇合

〔186〕一 于无声处响惊雷

〔191〕二 世界相会在鸟巢

〔196〕三 不合作的朋友

〔202〕四 在世界舞台上表演

〔209〕五 现代与传统之间

❧〔218〕第十章 夕阳无限好

〔218〕一 人道卫士

〔223〕二 古鲁特父

〔227〕三 不竭的源泉

〔232〕四 太阳的静谧

❧〔237〕主要参考书目





第 7 章

登峰造极

一 愤怒的呐喊

1905年1月19日,罗宾的父亲,大仙代温德拉纳特·泰戈尔与世长辞了。这对罗宾来说,又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父亲是他的精神导师,父亲在世,罗宾便觉得有主心骨,有所依靠,有迟疑不决的事,父亲会帮他拿主意;精神的迷惘和心灵的苦闷,也可以从父亲那里得到抚慰。失去精神导师,罗宾觉得眼前一片昏暗。

大仙不仅是罗宾的精神导师,也是印度民族的精神导师,即思想启蒙者之一。大仙的去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在世88年,恰逢印度近现代史的启蒙时代。在此之前,印度民族在侵略者打击下昏倒在地,这时,它在慢慢苏醒。它需要整理自己褴褛的衣衫,需要梳洗自己的蓬头垢面,需要医治创伤,然后慢慢地回忆起过去的辉煌,面对现实,寻找前进的道路。一批首先觉醒的人,便承担起了唤醒他人,唤醒整个民族,为他们恢复记忆,恢复勇气,寻找道路的责任,代温德拉纳特就是这样的先觉者之一。代温的时代,既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又是一个改良的时代,启蒙表现在思想精神方面,改良表现在社会现实方面,二者一里一表,标志着



印度民族的觉醒和进步。说来也巧,他的诞生(1817)恰逢启蒙与改良时代的开始;他的逝世,又象征这一时代的终结。

大仙对罗宾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不是生命染色体的遗传,而是精神的熏陶和为人处世原则的确立。在生离死别的悲痛中,罗宾缅怀父亲的音容笑貌、道德风范和他对自己的教诲。在罗宾的回忆中,最先出现的是父亲的宽容精神,无论对人还是对事物,他都能容忍多样性。他本人是梵教徒,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仪规并终生不渝,然而他对待其他宗教,如正统印度教、锡克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也都不抱成见。罗宾又想起了与父亲一起瞻拜锡克教金庙,和锡克教徒一起顶礼唱歌的情景。这在充满教派冲突与隔膜的印度是极为少见的事情。对于家庭成员的宗教信仰,对于孩子们的发展道路,父亲既不放任,也不勉强,表现出有原则的宽容。这种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道德和责任,任何时候不能违反道德,不能放弃责任,这是他自己的原则,也是他对人对事的要求和衡量标准。父亲对自己的几次正式谈话,现在想来,无不是以道德和责任为中心,都是关系道德与责任的重大抉择。分析起来,罗宾自己的生活和创作中背负着沉重的道德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正是父亲的精神遗产的一部分。

当然,大仙对罗宾的影响也是复杂的。这种影响像一个支架,既可以使罗宾赖以站立起来,又增加了罗宾行走的困难。凭罗宾的理想主义气质和他所受的现代文明的教育,他应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然而,由于父亲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他的思想始终不能超越启蒙与改良的框架,使他的生活和行为始终与现代文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父亲去了,罗宾人到中年,已经被塑造完成。大仙安详地走了,去了他40多年前就想去的地方,获得了解脱。罗宾在圣地尼克坦父亲生前喜欢静坐的地方立了一座纪念碑,并刻上诗句:

他是我生命的安息,
我心中的欢乐,
我灵魂的和平。





罗宾送走了父亲,经过一番冥想,理清了自己的思路,眼前昏暗渐渐退去。他不需要支架也可以站直,也可以健步行走了。

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正酝酿着新的爆发。此时担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是一位顽固的殖民主义者,他在任期间,对印度的民族主义一直采取强硬态度。就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即1905年,他宣布对孟加拉实行分治。原来的孟加拉又称孟加拉管区,是英国治下的印度三大管区之一,包括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三个邦(亦称州),人口7800万,其中孟加拉人约4100万。孟加拉人一半信仰印度教,一半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在东孟加拉(今孟加拉国)占多数,印度教徒在西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占优势。孟加拉分治法案是把孟加拉一分为二,东孟加拉加上阿萨姆划为一个邦,人口3100万,其中2/3是伊斯兰教徒。其余部分为“孟加拉邦”,但孟加拉人仅占1/3弱。殖民当局通过孟加拉分治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分裂孟加拉民族,因为孟加拉地区启蒙较早,民族主义意识较强,是民族运动的重要基地。分治后,大部分孟加拉人脱离政治中心加尔各答,从而削弱民族运动的力量。二是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制造矛盾,煽动宗教仇恨。因为分治的理由之一是提高伊斯兰教徒的政治地位,使伊斯兰教徒占多数的东孟加拉成为一个政治实体。这是殖民主义者对印度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的首次尝试,这一政策最终导致了印度的分裂。这样挑起教派斗争之后,伊斯兰教徒与印度教徒之间互相残杀,英国殖民主义者可收渔翁之利。

印度的有识之士早已看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企图,泰戈尔就是先觉者之一。在此之前他就向国人发出警告,提防英国人利用印度的宗教矛盾,并在自己的领地上尽力做好团结穆斯林的工作。然而,大部分印度人却意识不到这一点,许多民族主义政治家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大量利用印度教,煽动宗教狂热情绪,不仅给教派主义提供了温床,引起穆斯林的不满,而且给英国人的分而治之提供了可乘之机。法案通过后,殖民主义者的罪恶企图已经昭彰,孟加拉人民群情激奋,掀起了反对分割孟加拉的斗争,印度民族运动出现了新局面。

殖民主义者分割孟加拉的行径令泰戈尔愤慨,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又使他感到振奋。民族在觉醒,恒河在咆哮,人民的爱国热情非常高涨。罗宾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要呐喊。





虽然泰戈尔从来不是吟风弄月的诗人,但他的风格向来是比较含蓄委婉的。与急风暴雨相比,他更喜欢风平浪静;与山呼海啸相比,他更喜欢鸟鸣溪唱;与利剑相比,他更喜欢花环。然而,现在他怒不可遏了。祖国在召唤,恒河在咆哮,大海在呜咽,罗宾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漫步遐想?他有一种尽弃故我的感觉,他为这种感觉而惶惑,也为这种感觉而振奋。他本来向自己的神乞求花环,如今却得到一把利剑,他先是有点怀疑:

我坐下沉思,这是你的恩典?

将它收藏,我可没有合适的房间。

呵,这果真是你的恩典?

但他还是响应了神的旨意,收下了这件礼物,用它斩断自己的怯懦和忧虑,并且带上它去冲锋陷阵:

从今在世上我抛却了忧虑,

我的一举一动包含你的胜利,

我抛却了忧虑。

你把死亡,也留在了我的闺房,

我把它接受,藏在心里。

你的佩剑斫断了我的樊篱。

我抛却了一切忧虑。(《渡口集·赐予》)

不顾家庭经济拮据,罗宾创办了一份政治性月刊《宝库》,作为阵地和喉舌。他发表一篇又一篇的政论文章,抨击殖民当局的政策。他觉得,这是唤醒民众,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机会。于是他走出书斋,参加群众集会,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必须记住,不管英国人做过什么,不管他们听不听我们虔诚的呼声,我们的国家永远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祖先和子孙后代的国家,是我们生活的赐予者,力量的赐予者,幸福的赐予者!印度的命运应该由我们自己来掌握!”





听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罗宾德拉纳特成了运动的旗手，成了大家心目中的领导者。

历史赋予了泰戈尔家族以特殊的使命，这个名门望族已经产生了两代领袖，在加尔各答和孟加拉地区有很高的威望，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如果说罗宾的祖辈和父辈承担了启蒙和改良时代的领导任务，那么罗宾就应该承担起这个暴风雨时代的领导责任。罗宾像临阵的战士一样心情昂扬，他夜不成眠，一颗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在剧烈跳动，一种激昂的旋律在胸间回荡，不吐不快，他披衣下床，挥笔写下一首歌词：

我能生在这一片地上，因此我有运气去爱她，我是有福的。

即使她不曾拥有王室的珍宝，但是她的爱的活财富，对我就
够宝贵的了。

……(《诗选》38)

他按照心中的旋律为歌词谱上曲子，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嘴里哼着新创作的歌曲，一直到深夜。

第二天，在数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泰戈尔演唱了他新创作的歌曲，大家静静地听着，个个眼里噙满了泪水，大家忘记了鼓掌，忘记了一切，沉浸在热爱祖国的情怀中，沉浸在深情而优美的旋律中。良久之后，大家一阵欢呼，把诗人抬起来，举行游行，泰戈尔和大家一起，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这首表达对祖国之爱的歌曲。

罗宾第一次感受到诗歌的巨大威力。在随后的几天里，他又写出了一系列爱国的诗和歌曲。他的歌不胫而走，四处传唱，人们在集会上，在朋友聚会时高唱着他的歌，朗诵着他的诗；学生在课堂上，在操场上唱着他的爱国歌曲；人们走在大街上，甚至回到家中，还在唱着这些歌，通过歌声，大家互相交流着爱国的感情，从中汲取力量和勇气。

在这样的爱国热情的聚合反应中，泰戈尔自己也获得了鼓舞和力量，他要把自己的才华献给祖国，他早已厌倦了小鸟式的呢喃，他要喊出心灵的强音，他要把笔变成火把，去照亮昏暗的大地，去点燃人们的心灵之火。一种崇高的渴望和热





切的乞求在他的心中升起：

让我祖国的地和水、空气和果实甜美起来，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的家庭和市廛，森林和田野充盈起来，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的应许和希望，行为和语言真实起来，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儿女们的生活和心灵合一起来，我的上帝。

（《诗选》43）

罗宾把这心中的呼唤写下来，谱上曲调。第二天，举行群众游行，罗宾走在队伍前列，唱起了这首歌。歌词慷慨，歌曲昂扬，表达出了大家的心声。后来罗宾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游行队伍随着歌曲的旋律行进。歌声鼓舞了群众，沟通了千千万万的人。街道两旁围观的人，甚至奉政府之命前来准备镇压游行的警察，都被游行队伍的井然有序和发自肺腑的歌声的庄严感动了。

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起来了，谁能担负领导责任？当时唯一的具有全国性的政治组织是国大党。然而这时国大党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居国大党领导地位的郭克雷、班纳吉等温和派领导人，想用一贯的呈递请愿书的方式打动殖民统治者，不愿发动群众，甚至害怕已经自发行动起来的群众运动会惹怒统治者。而提拉克、奥罗宾多·高士和比·帕尔等激进派则对反分割的群众运动热烈欢迎，希望把运动推向全国，并将其引导到争取印度民族独立的道路上去。显然，国大党激进派将要担负起运动的领导责任。然而运动之初，激进派的主要领导人提拉克和奥·高士都在外地，孟加拉地区激进派力量相对较弱，比·帕尔一人孤掌难鸣。这时罗宾德拉纳特已经成了自发的群众运动的领袖，受到比·帕尔等人的重视。泰戈尔过去一直对国大党的活动不感兴趣，认为他们整天带着给政府的陈情书和抗议书来回奔走，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现在，在支持群众的爱国热情方面，他和国大党极端派领导人产生了共鸣。于是，泰戈尔会见了比·帕尔，他们的握手，使孟加拉的反分割运动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虽然有群众基础，但这时激进派在国大党内还是占少数，他们的行动受到指责，感到势单力孤。罗宾专门为他们写了一首鼓舞斗志的歌曲：





如果他们不响应你的号召自己走开了，
如果他们害怕，无言地畏缩着面对着墙，
呵，不幸的你，
敞开心怀独自发言吧。

如果他们在穿过旷野时自己走开，背弃了你，
呵，不幸的你，
把荆棘踩在脚底，沿着血迹独自前进吧。
……(《诗选》40)

1905年10月16日，是分治决议生效的日子。罗宾和比·帕尔等人商议，决定将这一天定为“志哀日”，组织群众在加尔各答举行孟加拉全民哀悼活动。活动的形式由罗宾负责设计。罗宾想，英印政府实行孟加拉分治的目的就是在印度人民中间制造矛盾和分裂，那么我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就要强调印度各族人民的团结，应该在志哀日活动中突出“团结”这个主题。这天清晨，数万群众走上街头，罗宾组织起游行队伍，向恒河边走去。沿途不断有群众加入游行行列，人们高呼爱国口号，高唱由罗宾创作的爱国歌曲，走到恒河边上。

恒河是印度的母亲河，是一条圣河，它发源于喜马拉雅山，横贯整个北印度，连接东西孟加拉，最后注入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恒河是印度的象征，它像一条纽带连接起印度各族人民。根据罗宾的设计，游行群众进入恒河沐浴，祈祷神的祝福，感受祖国之爱。人们互相在手腕上缠上丝线，以示团结，同时唱起罗宾专门为这个仪式创作的歌曲：

所有孟加拉的兄弟们，
让我们永远心连着心，
永不离分！



雨季之后的恒河汹涌澎湃,孟加拉人民的爱国激情汹涌澎湃。罗宾站在恒河水中,看着恒河奔流不息,滔滔东去,听着恒河不停的咆哮,热泪夺眶而出。

孟加拉的反分割运动发展为司瓦代什运动。司瓦代什 (swadeshi), 又译司瓦德西,意思是自力更生,主要指发展民族工商业。罗宾参与了运动的领导工作。他想起了五哥乔提一生的奋斗,想起少年时代和五哥一起为发展民族工业所作的努力,想起五哥与外国公司竞争的惨败,他觉得司瓦代什是救国之路。他发表文章揭露英国对印度民族经济的压制,号召人民实行司瓦代什,并亲自开办了几家司瓦代什商店,带头经营国货。

运动在发展,顽固的殖民当局也采取了强硬态度。加尔各答大学的一些学生因为唱爱国歌曲,被学校开除。罗宾义愤填膺,向比·帕尔等民族运动领导人建议,成立一个民族教育学院,收容这些失学的学生,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个系统的民族教育计划。比·帕尔接受了这个建议。1906年学院成立,需要一个有名望而又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教育家来担任院长。此时,奥罗宾多·高士正在担任巴洛达学院的副院长,应邀来到加尔各答,担任民族学院院长。罗宾发现,这位比他小10多岁的奥罗宾多是一位非常有才华,有学识,又有魄力的人物。奥罗宾多也非常敬慕泰戈尔,共同的理想和志向使他们走到一起。作为一贯倡导民族教育的罗宾德拉纳特和作为民族学院院长的奥罗宾多一起制定了一个民族教育计划,这个计划虽然在当时不能完全实现,但却是印度民族教育的一个里程碑。泰戈尔为民族学院学生作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的讲演,题目包括《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材料》、《文学思想家》、《世界文学》、《美感》、《美与文学》、《文学创作》等,这些讲演于1907年以《文学》为题汇集出版。这是泰戈尔第一次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文学思想,也是印度近代文学中最早的比较系统的文学理论。

奥罗宾多·高士的到来,大大加强了孟加拉地区国大党激进派的力量。他应邀参加了《向祖国致敬报》的编辑工作,并且很快就成为该报的实际主编。他把孟加拉地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组织起来,公开作为国大党的一个派别,并且奉提拉克为领袖,与印度其他地区的激进派密切配合,对国大党温和派进行斗争,并把《向祖国致敬报》变成激进派的机关报。1806年国大党年会上,激进派具有强大的势力,在他们的努力下,年会通过了司瓦拉吉、司瓦代什、抵制和民族教育等决





议。这样便将反对分割孟加拉的群众运动引导到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道路上。

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因为抵制英货与发展国货是反正两面,而且前者比后者更容易,所以“抵制”代替了司瓦代什,成为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群众中出现了焚烧英国货的行为。泰戈尔觉得势头不对,呼吁群众不要实行过激行为,然而群众运动已经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了。

与泰戈尔相反,国大党激进派对通过的决议还嫌不够激进,而对其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解释。他们把运动的目标定为司瓦拉吉,又进一步把司瓦拉吉解释为独立,为了实现这种司瓦拉吉,可以使用各种手段,首先是消极抵抗,包括抵制英货,退出政府所办的学校和各工作部门,其次是非武装的积极抵抗,最后是武装抵抗。为此奥罗宾多等人与秘密组织建立了联系,为武装起义作准备。与此同时,秘密组织开始走向恐怖主义。

罗宾发现他参与领导的爱国运动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好像看到了暴力和恐怖的影子,他感到困惑。

二 孤独的建设者

1906年,当司瓦代什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罗宾德拉纳特的18岁的儿子罗提已经完成了基础学业。罗宾开始考虑儿子的前途问题。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这是当时印度上流社会的时尚。一般人都向往牛津、剑桥等英国名牌大学,挑选专业以法学为主,回国后可以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者当律师挣大钱,成为上流社会的绅士。以前罗宾曾经问过儿子,愿意到什么样的大学去学习,儿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牛津、剑桥啦!”罗宾未置可否。眼前的司瓦代什运动,使罗宾更明确地认识到,印度缺少的不是绅士,不是政客,而是科技人才。他决定送儿子去美国,到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去学习农业科学。

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罗提。罗提一脸的不高兴,说道:“人家都到英国去学法律,我到美国去学农业,多没面子啊!人家都说美国是个暴发户,根本没什么文明。”

罗宾说道:“送你去国外去学习不是去学什么文明。印度有的是文明,东方的



精神文明远远超过西方。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科学,要多学科学。现在,东方落后于西方,就是因为缺少科学。我们只有掌握了科学,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你看见我们的司瓦代什运动了吗?尽管我们提倡国货,可是我们的国货总是不及外国货有竞争力。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太低。”

“可是为什么让我学农业呢?我去学先进的工业技术不好吗?回来可以开工厂、办企业。”罗提还是不理解父亲的决定。

“你不懂。”罗宾沉思片刻,才接下去说,“印度的工业的确不够发达,但印度的农业更落后,农民的境况更悲惨。我积十多年管理田庄的经验,对农业的重要性体会更深。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90%的人民靠土地为生,却有那么多人因为吃不上饭而饿死。我们田庄一亩地的产量,不及美国农场一亩地产量的1/10,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农业科学,耕作方法太原始。我办了一个农场,给农民作示范,推广农业先进技术。但是不仅我自己不懂农业科学,全孟加拉竟然找不到一个这方面的人才,所以我才让你去美国学习农业科学,回来给我做个帮手。印度需要现代农业……”说着说着,他声音有些哽咽。

“爸爸,我懂了!”罗提眼里噙满了热泪,他终于理解了父亲,“我到美国一定好好学习,回来建一个美国式的大农场。”

“好孩子!”罗宾也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在这个世界上他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说说心里话的人,他尝过了太多的孤独,太多的误解,所以儿子的理解使他大为感动。接着,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对儿子说:“孟加拉被分割了,英国人根本不听我们虔诚的呼吁。我们搞司瓦代什,又能有多大作用呢?对这样的吵吵嚷嚷的运动,我真有些厌烦了。他们只会发表演说,充满了感伤主义,让人窒息,那都是政治家们的花样。他们不知道,我们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才不会让人瞧不起,这需要实实在在的建设工作。唉!也许我天生就不是个政治家!”

泰戈尔虽然对外部世界的嘈杂感到心烦意乱,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送走儿子之后,他又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司瓦代什运动之中。他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领导运动。他对大学生发表演讲,号召他们为祖国做实事。在此之前,他也曾发表演讲,号召大学生到农村去,每人负责几个村子,进行组织工作,教育农民团结起来,利用科学技术发展农业和工业。他在自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要求人们





放弃仇恨,要以德服人,不要实行抵制,要努力发展自己的民族工商业,推广民族教育和文化,进行积极的建设性的工作。他听说有许多群众抢了一些商店的英国货物,准备当众焚烧,便赶去制止。激动和愤怒的群众根本不听他的劝阻,有人甚至质问他:是向着英国人还是向着印度人。他的这些言行有点不合时宜,几乎没有人听他的,这与一年前他在反分割运动时期一呼百应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

泰戈尔和国大党激进派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已经明朗化、公开化了。他的言行激起了激进派的反感,鉴于泰戈尔有很高的群众威望,激进派中有的主张公开反驳和批判,以消除运动的阻力;有的主张争取,使他站到正确的民族运动立场上来。于是,由比·帕尔出面,邀请罗宾参加关于民族运动方向问题的高层会议。

会议的参加者有国大党激进派,也有温和派,也有泰戈尔这样的国大党之外的群众领袖和知名人士。主持人介绍了孟加拉司瓦代什运动的情况,运动已经波及全印度,国大党年会通过了关于司瓦代什、司瓦拉吉、抵制和民族教育的决议。人民群众受到极大鼓舞,运动正在进入新的高潮,然后说明会议的宗旨。主持说完,激进派领导人发言,“现在,人民已经起来了,争取印度独立的时机到了,我们应该抓住时机,我认为,司瓦拉吉就是独立!”他的发言获得一阵热烈的掌声。

罗宾由于自己的言论没人响应,有些沮丧,原打算会上保持沉默,但这时却忍耐不住了,起来说道:“司瓦拉吉我是完全赞成的,但我认为这是将来的事,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印度社会内部还有很多弊端,很多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消除这些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我们才有力量,有资格实现司瓦拉吉。”

没等罗宾说完,一位激进派成员便站起来,打断他的话,说道:“照泰戈尔先生的说法,司瓦拉吉要等到何年何月呢?与泰戈尔先生的意见恰恰相反,我们必须首先实现司瓦拉吉,只有实现了司瓦拉吉,我们才能自由地解决那些社会问题。”

“那么靠什么实现司瓦拉吉呢?”罗宾反问道。

“靠什么?靠抵制!”对方脱口而出。

“别提你那个抵制了!”罗宾也顾不上斟酌词句了,愤愤地说:“你们的所谓抵制是一种憎恨行动,只会刺激人们的狂热和仇恨,不利于培养爱的精神,是不道德的!正是由于你们提倡抵制,才有了焚烧外国商品的不道德行为!”

他的话激怒了奥罗宾多·高士。奥·高士对泰戈尔很敬重,一直不愿直接冲突,





但此时却忍耐不住了,说道:“泰戈尔先生,你要知道,抵制是一场战争,没有道德不道德之分。美国人民在独立战争期间,曾经把英国茶叶倒在波士顿海湾里,谁能说他们不道德呢?同样,也不能谴责在印度发生的类似行动。”奥·高士的辩才博得了在场的激进派的喝彩,大家齐声喊叫:“说得对!”“说得好!”

罗宾也不示弱,继续争辩:“抵制、暴力,必然导致仇恨,破坏道德。印度的沦落是由于内部原因,而不是外部原因。企图在政治上走捷径,不仅于事无补,还会造成道德沦丧,失去爱和服务精神。”

“收起你那柄道德利剑吧!”不等罗宾说完,又有人起来反驳,“人民群众已经起来为祖国而斗争了,现在需要的是力量,而不是道德!要求群众像圣人一样,把爱举在头上,是束缚群众的手脚,是在帮助英国人!”又是一阵喝彩声,附和声。

罗宾力单势孤,论辩才能也不是那些政治家的对手,感觉有理说不清,一种懊恼和沮丧油然而生,他后悔不该参与这场争论,甚至不该来开这个会。他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祖国需要的是建设,而不是破坏!”然后走出大门。

回到乔拉桑戈祖宅,进屋躺在床上,他的心还在怦怦直跳。他感到委屈,心里愤愤不平。他虽然退却了,但并没有被说服,他心里还在与那些对手们唇枪舌剑地辩论着,他有一百条理由证明自己,驳倒对方,但当时却没想起来。现在又不能再回去与他们重新辩论。他只好拿出纸笔,一边清理自己的思路,一边奋笔疾书。印度的病根在何处?治疗的方案是什么?只有自身健康,才能抵御外敌的侵害。人们只注意了外部的的问题,而忽略了印度社会内部的问题,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的建设性工作上,而不是对着一个幻影作战。心灵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实现社会改革,才是获得真正的、持久的政治独立的根本。罗宾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文之后,心情才平静下来。第二天,他把文章题名为《疾病与治疗》,准备在下一期的《宝库》月刊发表。

罗宾连日来闭门不出。大街上不时传来游行呐喊的声音,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报刊上已经登出了批评泰戈尔的文章,有些是属于观点不同的商榷,有些则是恶意中伤,说罗宾德拉纳特已经被英国政府收买,开始替英国人说话,阻挠民族运动。罗宾不屑于同这些人去辩论清白。“随他去吧,”他想,“这些狂热的政治家,





除了玩弄计谋,就是高喊空洞的口号,谁是真正的爱国者,历史自有公论。我还是去做我的建设性工作吧。”这时,罗宾性格中的内倾性渐渐抬头,他似乎听到了心灵的呼唤,听到了神的呼唤,听到了寂园的呼唤,“回来吧,你的位置在这里,你的事业在这里,你的人生在这里!”他收拾好东西,交代完事情,随即回到圣地尼克坦。

民族运动不因泰戈尔的退出而有多大损失,而圣地尼克坦的“梵行院”却因他的归来而大获其益。近两年的时间,由于他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加尔各答的民族运动,学校工作陷于停滞状态,现在他埋头于学校事务,购置设备,聘请教员,扩大招生,修订教学计划,编写教材,一件一件都是非常具体而实在的工作。过去,他曾因自己陷入这样的繁琐事务而做不成大事感到烦恼,现在,他觉得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泰戈尔忍受着来自民族主义阵营的谴责、抨击、甚至辱骂,他把众人的愤怒引到了自己虔诚的头上,一个虔诚的爱国者被当成了叛徒、卖国贼。他忍受着来自政府的监视和迫害,他被列入了警察局的黑名单。有一次他的一位熟人到警察局办事,听到一位情报人员在向值班官员报告:“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B 级 12 号,从博尔浦尔来到加尔各答”。这位熟人把这事告诉罗宾,让他当心。罗宾惨然一笑,“我早知道他们在监视我,只是不知道我的代号是 B 级 12 号。”只是监视还不够,当局下令,禁止政府职员及有关人员送子女到泰戈尔的学校读书,更不准给他提供援助。

也许是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人群的明枪暗箭、内心的孤独寂寞都没有压垮罗宾,上天便再给他一个更沉重的打击。1907 年 11 月, 13 岁的小儿子绍明突然染上了霍乱病,没几天就死去了。绍明无论长相还是气质都非常像父亲,很受罗宾钟爱,指望他长大后能继承父业,然而他却少年夭亡了。这个打击对罗宾来说实在太大了,他怎么能承受得了啊!一时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世界的残酷对他来说已登峰造极。不到 5 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失去了妻子,失去了二女儿,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小儿子,这都是他最亲近的人哪!“我犯了什么罪,上天给我这么多的惩罚!还有完没完哪!”他心中泣血,向神起诉,“我是那么虔诚地爱你,爱这个世界,爱这个国家,爱所有的人,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回报啊?”